



浙江省文化工程丛书

SHEZU XIGUANFA YANJIU

畚族习惯法研究

——以新农村建设为视野

雷伟红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文化工程丛书

SHEZU XIGUANFA YANJIU

畚族习惯法研究

——以新农村建设为视野

雷伟红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畲族习惯法研究:以新农村建设为视野/雷伟红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8
ISBN 978-7-308-16112-1

I. ①畲… II. ①雷… III. ①畲族—习惯法—研究—
中国 IV. ①D922.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5588 号

畲族习惯法研究
——以新农村建设为视野

雷伟红 著

责任编辑 胡 畔(hlpp_lp@163.com)
责任校对 杨利军 陈 园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50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112-1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夏宝龙

副主任:王辉忠 葛慧君 龚 正 赵一德

刘 奇 郑继伟 孙景森 金德水

成 员:舒国增 胡庆国 李云林 吴顺江 胡 坚

徐明华 焦旭祥 刘希平 钱巨炎 金兴盛

寿剑刚 张伟斌 郑新浦 童 健 许 江

梅新林 陈德喜 蒋承勇 陈一新 马 以

鲁 俊 钱建民 徐加爱 陈 新 吴蔚荣

王永康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



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and 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序

爱与学术研究

爱有多种：有男欢女爱的情爱，有母子连心的母爱，有乡思成愁的乡爱，有心怀天下的仁爱……那么，学术研究，如何与这诸多形式的爱有所牵扯？

一般以为，爱之与学术研究，在“爱好”的意义上方有可能。诚然，把如上多样的爱纳入学术研究的框架，确实会冒一定的风险，毕竟爱是一个被赋予了更多情感意义的词语，而学术研究，无论如何，它应当是理性的、具有逻辑性的。即便特别要求以事实说话的人类学研究，也要求研究者在对事实的白描中，达到符合逻辑的、理性的叙事效果。

诚然，由爱好支撑的学术研究是有意义的，并且是一种真正的学术研究，也是研究者持之以恒坚持研究的关键。爱好的存废，决定着和爱好相关的学术研究的存废。一个人的学术爱好能持之以恒，相关学术研究大体也会持之以恒；反之，一个人的学术爱好半途而废，则即便还能不时见到其论著，也多为应景作业，很难让读者收获学术的金子——本来就是土质的材质，纵使其千淘万漉、吹尽狂沙，但要呈现出闪光的金子来，也是不怎么可能的。这表明爱好之于学术研究的基础意义。

可以认为，由爱好所生的学术研究，是一个人的事业和使命所系。以我的切身感受为例，我上大学前后，深受初中时代一位喜欢文史哲的化学兼体育老师的影响，也以为只有文史哲才是真学问，甚至为此还从高中到



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一直订阅《文史哲》期刊。因此,初入大学时,根本就不把法学当回事,也没有把它作为未来所从事的事业看待。直到大学三年级时,种种因缘际会,才开始对法学兴趣渐浓,也因此才将其确定为毕生从事的事业,并对之有了使命感。但即使如此,在我的学术研究中,仍然深受当年爱好文史哲的影响。

显然,由爱好引出的学术研究,无论如何比把其仅仅当作讨生计的方式更有利于学术本身的纯净和深化。当下吾国人文社科学术的弊端之一,恰在于学人大多把学术研究作为讨生活的方式。固然,这种在功利驱动和需要逼迫下的学术行为选取,也能够阴差阳错地带来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一旦有了能够取代学术研究而更方便地登堂入室、获取功利的手段,则研究者弃学术如敝履,也就既在逻辑之内,又在情理之中了。

但借由爱好所生的学术,能成为一个人的事业,并因此可能会升华为一个人的使命。事业和使命充其量只是人们追求的行而下的内容,因此,它最多只能与爱好结伴而行,而与更为广泛的爱,特别是与充满了人的自然感性的那些爱,还难以靠近、搭界并融合。在我看来,只有那种和一个人的最高生命体验结合起来的愛,才是真正助推学术研究的真爱、大爱。这样的爱,形似平常,实则非常。这种爱或许是情爱、亲爱、友爱等等“小爱”、“私爱”,也或许是乡爱、族爱、仁爱等等“大爱”、“博爱”。无论上述哪种爱,只要促使一个人不但以学术为业、为使命,而且因为这些爱把学术融于其终极的生命体验中,成为一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和象征,甚至成为其生命结构的底色或精神,那么,这样的学术研究,才可谓与爱结盟而行。

在人类学术史上,把上述“小爱”、“私爱”融于其中的情形很少听说,这绝不像在艺术领域、文学领域那样,“小爱”与“私爱”不但成为人类艺术和文学发生、成长的永恒主题,而且也是刺激艺术家、文学家创作的真正灵感和不竭源泉。在我看来,所谓“小爱”、“私爱”,本身是“大爱”、“博爱”的活水源头。古人强调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交相利、兼相爱”,“推己及人”这些话,分别从一个侧面说明由亲情“小爱”到天下“大爱”,由个人“私爱”到人间“博(兼)爱”的一般关系。所以,在学术研究



领域,人们尽管看到的更多的是理性、逻辑的发声,较难见卿卿我我的情感表白,但“小爱”、“私爱”对学者学术研究的激励,绝非无例可循。萨特和波伏娃相互支持的伉俪志业,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心照不宣的相互鼓励,甚至柏拉图因爱而笃守理性,金岳霖为爱而孤守终身……无不由“小爱”、“私爱”而延展开去,为生活史更为学术史添加了可以想象、可以开拓研究的空间。一部《爱欲与文明》,是否已然在学术理性层面表达了“解放爱欲”与建立人类普遍的、“非压抑性的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

当然,学术史的故事,主要还是由“大爱”、“博爱”所支撑的,其中缘由,在于理性和逻辑是学术表达的基本态度和方式。这种态度和方式,是决定学术人生的基本指标,也是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区别,当然,更是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区别。理性和逻辑尽管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佐料,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料——就如柏拉图的理念、金岳霖的逻辑等,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谈资一样。相信对芸芸众生而言,宁愿翻看《伊利亚特》,也不愿阅读《理想国》;宁愿默诵《人间四月天》,也不愿苦啃《知识论》。所以,如果说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而言,设法把“小爱”、“私爱”表现为人类一般之爱、普遍之爱是赢得读者的关键所系的话,那么,对于学术研究者而言,虽然以“小爱”、“私爱”为出发点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还不错,但倘若固守在这一出发点上而不能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也就不可能以理性精神、逻辑力量而泽惠天下、致用人间。

进言之,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学术文明的形式,或许取决于由“小爱”、“私爱”所结构的学术境界和由“大爱”、“博爱”所结构的学术境界之间的关系上。当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和研究者更多地受“小爱”、“私爱”的支配时,当学术研究的目的是献给父母、妻子或友人时,当学术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情爱、亲爱、友爱时,可以认为它仍旧是情感支配型的,是一种诗性化了的学术文明。这是一种早熟的文明,但同时也是把“小爱”、“私爱”的情感结构在学术人生命意义中的文明。当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和研究者更多地受“大爱”、“博爱”的支配时,当学术研究的目的是献给故



乡、祖国或人类时,当学术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乡爱、族爱、仁爱时,则可认为它是理性支配型的,是一种理性化了的学术文明。它是一种沉淀的文明,也是把“大爱”、“博爱”的理性结构在学术人生命意义中的文明。自然,我在这里不想也不愿比较这两种学术文明功用上的优劣,但无可怀疑的是,人类从关系社会迈向公民社会、从熟人社会迈向生人社会、从分配社会迈向交换社会、从权治文明迈向法治文明的过程,一定是理性支配情感、逻辑支配修辞、规范支配权变的社会。

绕了这么远,我必须回到伟红和她的这部《畲族习惯法研究》上来。这位出生于浙江畲家,印象中谈吐干练、举止敏捷的姑娘,为什么要以畲族习惯法为自己多年来学术探索的对象和路径?我想,这中间的爱——无论是对学术研究本身的事业爱好,还是对其民族、家乡的强烈大爱,都是支撑其数年如一日地投身于这一研究的原因所在吧?

作为主要聚居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广义上黎族也是,但其主要生活在海南地区,似划不进东南沿海),国民对畲族的了解未必深入。而对一位畲家学子来说,打小就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历练,其乡爱、族爱可以想见。近十年来,我因组织“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之故,多次见到伟红,甚至在这个系列会议举办之初,浙江学者参与甚少的情況下,伟红就首先积极支持并参与这个系列会议。每次与会,她带来的成果,都是有关畲族习惯法的论述。记得某次我问起她为何坚持这一研究,她很自然地流淌出这么一句话:“我对那里既熟悉,又喜欢。”我想,这正是其数年来积极投入畲族习惯法研究的动力所在吧?这不正说明对伟红而言,生活中亲爱、情爱、乡爱、族爱等种种的爱与其学术研究的内在关联吗?

一年多前,伟红在上海一次会议上找到我,希望我能给她的这部书写个序,当时我就愉快地答应了。直到两周前最终确定这部书的出版社后,她再次来信邀我写序。这两周末,讲课之余,我一直翻看,深为书中翔实的材料和有趣的叙述所打动。这是目前国内出版的最全面的畲族习惯法研究专著,也是通过翔实的材料系统地对畲族的婚事、丧葬、社会(民事)交



往、生产分配、所有权关系以及纠纷解决等习惯法予以梳理、探讨的专著。自然，它更是浸透了作者的爱和心血的一部学术专著。

我相信，作者会以这部专著为起点，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畲族习惯法的田野研究；在浙、闽畲族习惯法的描述性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对浙、闽畲族习惯法和粤、赣、皖、湘、贵等地畲族习惯法的研究，特别是与湘、贵等地畲族习惯法的比较研究和提升性研究；在畲族习惯法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畲族习惯法及与畲族有族源关系的瑶族习惯法的比较研究……我也相信，作者会一如既往、持之以恒地将她对家乡的爱、对民族的爱融入其深爱的畲族习惯法的学术研究中。

是为序。

陇右天水学士谢晖

2014年12月14日，于长沙

目 录

导 论/1

第一章 畬族习惯法概述/5

第一节 畬族习惯法的概念、特点/5

第二节 畬族习惯法的功能/12

第三节 畬族习惯法的产生、发展/16

第四节 畬族习惯法的表现形式/18

第二章 畬族宗族习惯法/22

第一节 族/23

第二节 房/74

第三节 家/78

第四节 畬族宗族习惯法的特点和作用/98

第三章 畬族社会组织习惯法/110

第一节 福宁山民会馆(三明会馆)/110

第二节 其他社会组织/114

第四章 畬族婚姻习惯法/125

第一节 婚姻的成立/125



第二节 婚姻缔结形式和程序/142

第三节 夫妻关系和婚姻解除/154

第四节 畲族婚姻习惯法的特色及其作用/160

第五章 畲族的丧葬和宗教信仰及社会交往习惯法/163

第一节 丧葬习惯法/163

第二节 宗教信仰、宗教活动习惯法/178

第三节 社会交往习惯法/203

第六章 畲族的生产和分配习惯法/210

第一节 农业生产习惯法/210

第二节 狩猎生产习惯法/223

第三节 副业生产习惯法/231

第七章 畲族的所有权和债权习惯法/245

第一节 所有权习惯法/245

第二节 债权习惯法/255

第八章 畲族习惯法的实施及纠纷解决/277

第一节 畲族习惯法的实施/277

第二节 畲族的纠纷解决习惯法/280

第九章 畲族习惯法对畲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上)/297

第一节 畲族地区当代社会的变迁和畲族习惯法的传承与变迁/297

第二节 畲族习惯法对畲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法制建设的影响/305



第十章 畲族习惯法对畲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下)/341

第一节 畲族习惯法对畲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建设的影响/341

第二节 畲族习惯法对畲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355

第三节 畲族习惯法对畲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370

附 录/374

参考文献/384

索 引/393

后 记/394

导 论

畲族是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湖南、安徽等地的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杂散居民族,其中大部分居住在福建、浙江广大山区。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内地畲族人口共有 708651 人,其中男 383213 人,女 325438 人,福建有 365514 人,占总人口的 51.58%,浙江有 166276 人,占总人口的 23.46%,江西有 91068 人,占总人口的 12.85%,贵州有 36558 人,占总人口的 5.16%,广东有 29549 人,占总人口的 4.17%,湖南有 3059 人,占总人口的 0.43%,安徽有 1682 人,占总人口的 0.24%。浙江畲族主要分布在温州、丽水、杭州、金华、宁波等地。设有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地方——景宁畲族自治县,并设有 18 个畲族乡(镇),畲族人口占 30% 的行政村有 400 多个。福建畲族主要分布在宁德市、福州市(连江县、罗源县)、厦门市、莆田市、三明市、泉州市、漳州市(漳浦县、龙海市)、龙岩市的上杭县。其中占福建畲族总人口一半的闽东宁德市的畲族主要分布在宁德市区、福安市、福鼎市、霞浦县;福建省设有 16 个畲族乡(镇)。

畲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学术界对畲族文化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书籍。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1906 年浮云的《畲客风俗》,1923 年胡先骕的《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1924 年沈作乾的《括苍畲民调查记》,1933 年德国史图博、李化民的《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1933 年何子星的《畲民问题》,1934 年许蟠云、范翰芬、王虞辅的《平阳畲民调查》,1941 年管长埔的《福建之畲民》,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编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1988 年施联朱的《畲族》《畲族风俗志》,蒋炳钊的《畲族史稿》,1991 年朱洪、姜永兴的《广东畲族研究》,1995 年施联朱、雷文先的《畲族历史与文化》,1997 年雷弯山的《思维之光——畲族文化研究》、陈国强主编的《畲族民俗风情》,1999



年浙江省少数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浙江省少数民族志》、雷恒春主编的《中国民族文化观·畲族编》、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的《浙江省民族乡(镇)概况》,2002年雷弯山的《畲族风情》、蓝炯喜的《畲民家族文化》、吴永章的《畲族与瑶族比较研究》、谢重光的《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游文良的《畲族语言》、蓝雪霏的《畲族音乐文化》,2003年施联朱的《施联朱民族研究文集》、蓝炯喜的《猴墩茶人》,2005年石奕龙、张实主编的《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2006年邱国珍、姚周辉、赖施虬的《畲族民间文化》,2009年钟雷兴主编的《闽东畲族文化全书》,郭志超的《畲族文化述论》,钟发品、王群的《武义畲族三月三》,2010年邱国珍的《浙江畲族史》、朱丹的《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王道的《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等著作。此外还有一大批省、市、县、乡、村的畲族志陆续面世。

畲族习惯法不仅是畲族灿烂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国习惯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习惯法是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就此撰写了论文、出版了专著。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高其才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2003),谢晖、陈金钊的《民间法》(2002—2009),张冠梓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2002),田成有的《乡土社会的民间法》(2005),李可的《习惯法——一个正在发生的制度性事实》(2005),杜宇的《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2005),厉尽国的《法治视野中的习惯法:理论与实践》(2010),吴大华、潘志成、王飞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论》(2014),高其才的《瑶族习惯法》(2008),陈金全的《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2008),徐晓光的《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2006),陈金全、巴且日伙的《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2008),李鸣的《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2008),吕志祥的《藏族习惯法及其转型研究》(2014)等,这些著作研究了习惯法的理论和实践,阐述了瑶族、彝族、壮族、苗族、侗族、羌族、藏族等民族习惯法的内容、传承与现代化。在国外,习惯法地位较高。它是西方中世纪法律的主要形式,也是当今英、美普通法的主要内容,在国际法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学术界对畲族文化和习惯法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主要居于东南沿海的畲族的习惯法的研究比较薄弱,仅有少数学者涉及,如张冠梓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石奕龙、张实的《畲族:福建罗源县八井村调查》,仅介绍了畲族刑事、民事习惯法部分内容,没有涉及畲族